DOI : https://doi.org/10.63944/shfc.RCS
Vol.2 No.4

古代中国-斯里兰卡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

陈 鸥 [1]

（1.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黔西南 562400）

[摘 要] 古代中国-斯里兰卡国家关系史是中国-斯里兰卡国家交往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独特构成部分。通过文献分析梳理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史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初探期（东晋-南北朝时期）、发展期（唐-宋时期）、高峰期（元朝-明朝前期）和中断期（明朝中期以后）。纵观跨越千年的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史，和平、友好与相互学习始终是两国交往的主轴。通过分析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史，从古代“王道外交”与当代“和平外交”、古代“朝贡关系”与当代“合作伙伴关系”和古代“民间交流”与当代“人文外交”三个方面总结了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对当代中斯国家关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古代中国-斯里兰卡国家关系史；古代中国对斯里兰卡外交政策；中斯关系；区域国别

[基金项目]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建构主义视角下南亚国家对华外交政策国别比较研究”（23XYBS0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a-Sri Lanka Relations

Ou Chen[1]

[1]*Minzu Normal University of Xingyi, Qianxinan, Guizhou,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Sri Lanka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Sri Lanka interactions, as well as a distinctive part of ancient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By analyz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ancient China-Sri Lanka relations can be clearly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initial exploration phase (Eastern Jin to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phase (Tang to Song dynasties), the peak phase (Yuan dynasty to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interruption phase (mid-Ming dynasty onward). Throughout this millennium-long history, peace, friendship, and mutual learning have consistently been the main themes of bilateral engagement. By examining this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we summarize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ancient “Confucian diplomacy” versus modern “peaceful diplomacy,” ancient “tributary relations” versus contemporary “partnership,” and ancient “civilian exchanges” versus modern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Keywords: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Sri Lanka Relations; Ancient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 Sri Lanka; China-Sri Lanka Relations; Sri Lanka, Area Study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扼守印度洋战略要冲位置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人文与贸易交流的重要结点。历史上，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很早就有人员来往。斯里兰卡古籍《南传弥兰王问经》（*The Sihalavattuppakarana*）有记载，

作者介绍：陈鸥（1978—），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研究（南亚方向）。

有几位斯里兰卡僧人在公元前 2～公元前 1 世纪曾到过当时中国的都城。[1]3 成书于公元 1 世纪的古罗马著作《自然史》（*The Naturalis Historia*）中记载，“当时斯里兰卡与中国之间已有商业往来”。[2]122 因此，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政界和学界都经常用“千年交往”来形容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并认为今天两国友好关系也得益于这“千年交往”的历史。国家关系是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斯千年交往史中，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面貌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课题。中斯国家关系在中国学界长期处于相对冷门的状态。近年来，随着斯里兰卡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以及区域国别学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学者也逐渐加大关注中斯国家关系。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其关注点主要是在当代中斯国家关系，而对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研究总体还不足。现有的关于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学术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研究古代中斯关系的某一方面的过程中论及了古代中斯国家关系。例如，刘耀辉和唐春生在《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一文中从文化互动、经贸往来和官方外交三个方面论述了古代中斯两国的文化交往，并提出了“官方外交促进双方贸易”的观点；[3]88-93Rohan Gunaratna 在《中国-兰卡联系：人文关系 2000 年》一书探究了中国与斯里兰卡长达两千年的文化、宗教和贸易联系，从侧面反映了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人文脉络；[4]斯里兰卡宗教学者索毕德在其博士论文《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中，从佛教交流的角度用一个章节简要概述了古代中国-斯里兰卡两国的政治交往；[5]Moratuwe Sasanarathana 在《兰卡大乘佛教史》一书中搜集整理了一些斯里兰卡古籍中涉及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史料。[6]123

二是研究某一段历史时期的中斯国家关系。例如，许道勋等在《汉唐时期中国与师子国的关系》一文中分三个时间段简要讨论了汉唐时期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政治交往；[7]Arunachalam 在《中世纪时期锡兰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一文中借助斯里兰卡史籍从斯里兰卡的角度介绍了斯里兰卡与中国在这一时期的政治交往；[8]K. M. M. Werake 在《重考 15 世纪中国对斯里兰卡关系》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明朝前期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国家关系；[9]Lorna Dewaraja 在《郑和访问锡兰与科伦坡国家博物馆藏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一文中回顾了郑和下西洋时出使锡兰国并代表明朝政府布施锡兰佛教寺庙的外交史实；[10]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从 119 部中国古代典籍中搜集整理了关于南亚的史料，其中不乏涉及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重要史料；[11]江勤政在《我们和你们：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一书中通过叙述故事的形式讲述了古代中斯交往的几个重要事件，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12]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文献存在有两点不足。首先，现存已知记录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文献在数量上严重不足。其次，现有学术文献对于古代中斯国家关系方面关注较少，少量以古代中斯国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献，基本上是研究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或者某个历史事件，缺乏对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总体分析。本文直接以古代中斯国家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逻辑梳理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和整体分析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对今天中斯国家关系的现实意义，从而形成对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相对整体的认知。

二、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

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关于中斯国家关系的信史记载[13]见于《梁书》：“师子国，天竺旁国也 …… 晋义熙初作者注：公元 405-418 年，始遣献玉像，经十载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14]800 而中国古代官方正史中最后关于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信史记载则见于《明史》：“是年（作者注：天顺三年 1459 年）哈密、琉球中山、锡兰山、满剌加入宫。”[15]156 上述文献中的“师子国”和“锡兰山”均是当时中国人对斯里兰卡的称呼。由此可知，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信史跨越千年之久。本文将从初探期、发展期和高峰期三个历史阶段梳理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

（一）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初探期（东晋-南北朝时期）

现存史料表明，在古代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开启官方交往之前，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人民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民间交流。古罗马军官及学者 Gaius Pliny（公元 23-79 年）在其著作《自然史》中记载了，出使罗马的斯里兰卡使节曾介绍说斯里兰卡和中国当时有贸易往来，使节团长的父亲就曾到过中国。[16]22 公元 1 世纪希腊古籍《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则描述了，在斯里兰卡这个当时的重要的世界贸易交流中心，中国丝绸最有名。[17]1-39 这说明最迟在西汉时期，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就已经开展了民间贸易活动。通过民间贸易交流，古代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人民开始了最初的相互接触和探索，并形成了经过地理实证的人文认知，这为开启古代中斯国家关系

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中国官方对与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海外诸国进行民间贸易交流至少是持默许态度的。

另外，宗教交流也为开启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做了关键的“人才准备”。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公元纪元前后经过西域传入汉地的。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有“西方佛国”的僧人不畏艰难地来到汉地传经传教。同时，由于佛教经典繁多，而传入汉地的佛教经典有限且外国僧人的翻译多晦涩难懂，所以有很多汉地僧人也不畏艰险地去“西方求真经”。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有曾求学师子国两年的东晋高僧法显和同时期来中国创建最早的汉地比丘尼僧团的比萨罗等 11 位师子国比丘尼。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朝廷总体上对佛教持开放欢迎的态度，来到中国的外国僧人一般都会受到礼遇，中国皇帝也时常亲自接见来自“西方佛国”的高僧大德。同时，佛教僧人在斯里兰卡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和政治地位。因此，这就使得佛教僧人具有了成为古代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外交信使的天然优势。

斯里兰卡历史学家 Moratuwe Sasanarathana 考证斯里兰卡史籍后认为，古代斯里兰卡的君主大约从公元 1 世纪开始就希望与中国进行官方交往。[6]123 但是，可能是因为路途太过遥远、艰辛和危险，或是古代造纸术发明之前史籍极易损毁遗失，以至于现存古代中国文献记录的最早关于中斯国家关系的事件发生于东晋义熙（405-418 年）初年，师子国国王派遣僧人作为使节历时十年到达中国首都，向中国皇帝进呈了一尊珍贵的玉佛像。[14]800428 年，师子国国王派遣了四位僧人和两位白衣随从向中国刘宋朝文帝进呈了珍贵的佛牙舍利台座的象牙仿制品，并表示“欲与天子共宏正法，以度难化”。[6]123 ,[18]2384 527 年，师子国国王遣使觐见梁朝皇帝，也提出“欲与大梁共宏三宝，以度难化”。[14]800 由此可见，中国-斯里兰卡两国的史料都证实了正是佛教僧人承担了开启古代两国国家关系的历史重任，而且佛教还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共同话题”。

从东晋开始，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开始有了零星的外交交往。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斯里兰卡国王于义熙初年（405-418 年）、428 年、430 年、435 年和 527 年一共五次遣使觐见中国皇帝并赠送礼物，而中国皇帝亦有回赠礼物和赐予封号给斯里兰卡国王。但是，中国史书并无记载中国皇帝有在这一时期遣使访问斯里兰卡。这说明当时的中国皇帝还是在友好欢迎的外交基调上视斯里兰卡为遥远的“化外之国”。同时，从这一时期的中斯国家关系的内容来看，基本上是试探性地相互表达友好的善意，并未涉及任何实质性的政治内容。

（二）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发展期（唐-宋时期）

六世纪末，隋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自四世纪初西晋灭亡以后两百余年的分裂。随后的唐朝时期，中国国力空前强盛，威名远扬。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也和当时的很多国家一样，从官方到民间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这一时期也成为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发展期。在这一时期，中斯国家关系通过贸易和宗教两个渠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方面，当时中国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使得处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黄金结点”上的斯里兰卡对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性得到较大的提高。从唐朝开始，“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造船和航海水平的提高，海上丝绸之路日趋繁荣，海外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19]55 此时，中国朝廷在外交上对海外贸易是持支持鼓励政策的。因此，当时海外很多国家都争相与中国发展贸易关系。为了增强斯里兰卡国际贸易枢纽的地位和从中国获得更多的贸易机会，斯里兰卡再次开始加强与中国的外交联系。根据《新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斯里兰卡多位国王先后于唐高宗、唐玄宗和唐肃宗时期共六次派遣使臣携带珍贵礼物觐见中国皇帝。此后，从八世纪中期到十三世纪后期，中国史书再无关于斯里兰卡与唐朝和宋朝进行外交交往的官方记录。由于古代斯里兰卡缺乏象古代中国那样完备的历史记录，所以只能推测很可能是因斯里兰卡发生长期的动乱，或因中国唐武宗（845 年）和北周世宗（955 年）的“灭佛事件”及宋徽宗时期“毁佛”事件，使得崇佛的斯里兰卡暂时中断与中国的外交交往。但是，斯里兰卡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枢纽的外交形象在当时中国人心中已经树立起来了。这在当时中国人的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很好地反映出来了。例如，唐代诗人韩愈在《宋郑尚书赴南海》中有“货通师子国，乐奏武王台”一句。再比如，洪适在《设蕃乐语》中有“奇物试求师子国，去帆稳过大蛇洋”一句。

另一方面，虽然斯里兰卡在这一时期已经很少再委派僧人作为外交信使“代办”与中国的外交事务，但是宗教特别是佛教在这一时期的中斯国家关系中起到更加重要的甚至是无法替代的作用。第一，在这一时期，特别

是唐朝前期，斯里兰卡佛教僧人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对两国国家关系的正面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师子国僧人不空（Amoghavjra）生活在中国，在唐玄宗时期特旨回师子国学习佛教密法，因为携有唐朝的官方文书，不空在师子国备受礼遇，国王亲迎，为之沐浴，并住锡佛牙寺。学成归唐后，在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皆为灌顶国师”，“特赐法号曰大广智三藏”。[20]382-3783 师子国大菩提寺僧人释迦密多罗（Sakyamitoroth）以九十五岁高龄来到中国请求礼拜五台山，唐高宗李显和皇后武则天“恩许，仍资行调”，全程受到唐朝官方很高的礼遇。[21]1098 第二，这一时期，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佛教交流频繁，特别是到了唐朝中期中斯国家关系中断后，频繁的佛教交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通过两国宗教关系延续两国国家关系的特殊外交作用。在中国-斯里兰卡佛教交流方面，唐代有大量的中国僧人远赴斯里兰卡学习佛教经典，史书有记载的就有几十位之多，如：明远、慧日、义郎、窥冲、无行等。中国僧人到斯里兰卡后，大多都得到了斯里兰卡官方的礼遇。而来中国的斯里兰卡僧人不但在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他们中的一些高僧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不空和尚后来就成为了汉传密宗的祖师之一。“五体投地”的礼仪就是随着释迦蜜多罗和尚在五台山朝拜而传入中国，并成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最重要的宗教礼仪之一。

唐宋时期是古代中国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其对外来人才、外来宗教和对外贸易所持的开放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中空前绝后。得益于此，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稳步发展”。贸易和宗教因素仍然是推动中斯国家关系的重要驱动力。

（三）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高峰期（元朝-明朝前期）

从十世纪末南印度泰米尔人建立的朱罗王朝入侵斯里兰卡开始，到十三世纪初斯里兰卡北部的贾夫纳王国入侵中南部僧伽罗人的波隆纳鲁沃王国为止，斯里兰卡经历了长期不断的战争和动乱。这很可能是造成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在唐朝后期以后中断数个世纪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十三世纪初开始，斯里兰卡基本形成了中南部的僧伽罗王国与北部的泰米尔王国南北分治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而中国也在经历了长期的宋金蒙战争后，最终由元世祖忽必烈于十三世纪后期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元朝。元朝初期奉行“对外扩张”政策，这使得元朝比以前的中国王朝都更有意志和动力与遥远的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因此，到元朝初年，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又得以恢复外交交往。到明朝前期，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发展到了高峰。

不同于前两个时期斯里兰卡单方面采取主动外交政策，在这一时期的中斯国家关系中，两国都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有趣的是中斯国家关系的恢复很可能是从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命其长子去斯里兰卡采购药材开始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件中斯外交事件见于《元史》:“十年 作者注：至元十年，1273 年春正月乙卯朔, …… 诏遣紮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 [22]148 而史书中记载的第二件中斯里外交事件则是信奉佛教的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 1284 年命人出使斯里兰卡“观佛钵舍利，赐以玉带、衣服、鞍辔。” [22]318 历史何其相似，尽管到此时，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已经中断了几个世纪，但是贸易和宗教的纽带再次启动了两国的国家关系。

在元朝主动的外交联络后，据《元史》记载，斯里兰卡僧伽罗王国于 1286 年遣使来元朝。此后，元世祖忽必烈分别于 1273 年、1284 年和 1291 年遣使出使斯里兰卡。而斯里兰卡僧伽罗王国国王波罗伽罗摩巴忽三世（Parakramabahu III）于 1292 年也遣使来元朝。1293 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兵部侍郎忽鲁秃花等回访斯里兰卡，并赐斯里兰卡国王“三株虎符”。[22]374 此后，可能由于在 1294 年元世祖忽必烈驾崩后持续不断的皇位争夺以及接连对四周征战，使得元朝国力急剧衰落并导致外交政策收缩，以至中国史书中再无元朝与斯里兰卡外交交往的记录。

明朝建立后，为防止人口流失和货物走私以及打击海寇等原因，明廷从洪武朝到隆庆朝实施了约二百年的海禁政策。尽管如此，明廷依然实施了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并且以“主动外交联系”的方式构建和扩大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特别在永乐和宣德两朝，“欲觅迹之（作者注：指建文帝），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并“敷宣教化于海外诸蕃国”，[23]7766-7767,[24]12 明廷派遣郑和率领大型船队七次出使“西洋”与沿线各国开展外交活动。这七次下“西洋”始于 1405 年，止于 1433 年，每次都访问了锡兰。在这七次出使锡兰的过程中，明廷充分展示了“恩威并用”的“王道外交”。

由于锡兰绝佳的地理位置，郑和率领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舰队每次都要经停锡兰，但是从未有过后

来殖民斯里兰卡的欧洲列强的那种“血腥殖民掠夺”的外交目的，有的是通过彰显国威而实现“万邦来朝”的政治期待。所以，郑和的使团在锡兰主要是通过“恩服”来开展外交活动的。比如：每次访问锡兰，郑和使团都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携带大量礼物赠与锡兰王室。同时，通过大量布施佛寺等宗教活动拉近两国官方和人民的距离。在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出使锡兰时（1409 年），就奉旨在锡兰当地佛寺树立了著名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25]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斯里兰卡的三个主要民族僧伽罗人、泰米尔人和摩尔人分别信仰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而此碑虽立在佛教寺庙，但碑文确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分别致敬佛祖、毗湿奴神和安拉。因此，这反映出明廷考虑到了斯里兰卡当时的国情而采取了“一视同仁”的平衡外交政策。

当然，在这七次出使锡兰的过程中，明廷也展示了其“王道外交”中“威服”的一面。就在郑和奉旨立碑的第三次“下西洋”出使斯里兰卡的回程中，于 1410 年或 1411 年爆发了史称的“明-锡兰山之战”。《明史》卷三二六记载：“永乐中，郑和使西洋至其地 作者注：指锡兰山国 ，其王亚烈苦奈儿欲害和，和觉，去之他国。王又不睦邻境，屡邀劫往来使臣，诸蕃皆苦之。及和归，复经其地，乃诱和至国中，发兵五万劫和，塞归路。和乃率步卒二千，由间道乘虚攻拔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妻子、头目，献俘于朝。”[26]8444 从中可以看到由于亚烈苦奈儿（Alagakkonara V）经常充当“海盗”劫掠往来使臣和商船，早已引起周边国家的不满，而此次其打算对郑和使团图财害命，因此郑和不得不“替天行道”。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 Cyril Wace Nichola 和 S. Paranavitana 在合著《斯里兰卡简史：从早期时代到 1505 年葡萄牙人到来之时》中研究此段历史时也认同这一观点。[27]后来，明成祖“悯其无知”将亚烈苦奈儿及其全家释放了，然后“命择其族之贤者立之”。[26]8444“明−锡兰山之战”是古代中斯国家关系中最重大的外交事件之一，它产生了三个重大外交影响。其一，它成为导致斯里兰卡甘波拉王朝（The House of Gampola）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后明朝册封的波罗伽罗摩巴忽六世（Parakramabahu VI）于 1412 年开创了斯里兰卡科特王朝（The House of Kotte）。在两国从古至今约一千六百年的国家关系史中，这是唯一一次由于中国的外交行动直接改变了斯里兰卡的国家历史进程。其二，它直接促成了中国与斯里兰卡之间短暂的“朝贡关系”的确立。明朝直接将锡兰纳为朝贡番国。根据《明史》记载，从 1416 年到 1459 年，波罗伽罗摩巴忽六世共六次遣使携带珍贵贡品来明朝。第三，它对明朝在海外树立国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役之后，“自是海外诸蕃益服天子威德，贡使载道，王遂屡入贡。” [26]8444

（四）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中断期（明朝中期以后）

自郑和下西洋以后，由于太过耗费国力，明朝停止了海外“宣威”。从此，中国开始走向“闭关锁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从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在科伦坡建立要塞开始，斯里兰卡先后被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殖民统治了四百余年，也因此失去了与中国进行直接外交联系的主权国家身份。在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下，古代中斯国家关系进入了四百余年的漫长中断期。当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再次进行外交接触时，历史已经到走到了 20 世纪中叶了。1944 年 3 月 15 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任命了一位驻英属锡兰的领事。但是，直到 1957 年 2 月 7 日新中国与斯里兰卡建立正式国家关系后，斯里兰卡才正式委任现代中斯国家关系史上的第一位驻华使节。

三、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现实意义

根据信史，中斯国家关系横跨千年之久，而中斯民间交流更是超过二千年。虽然，古代中斯国家关系时断时续，但依然是内容丰富。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才能真正面向未来。

（一）古代中国对斯里兰卡的“王道外交”理念对今天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和平外交”理念的现实意义

在几千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史上，古代中国曾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并实践过两种不同的外交理念：“王道外交”和“霸道外交”。前者追求仁义道德，将仁义道德视作外交目标；而后者视物质利益为外交目标，而将仁义道德视作外交手段。[28] 践行“霸道外交”的秦、隋和元三朝皆是“至霸而国崩”的短命王朝，而“王道外交”才是古代中国外交的主流理念。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就深刻地反映出了古代中国的“王道外交”理念。纵观长达千年的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史可以看到，凡与斯里兰卡有过官方接触的朝代基本上都施行的是“重义轻利”的“王道外交”政策。象明代耗费巨大的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在前后近三十年时间里组织了七次庞大的“下西洋”外交活动，从一开始其外交目的就是和平的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所以明朝没有如随后而至的欧洲列强那样为了追求其国家的物质利益而用坚船利炮满世界建立殖民地。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船在近三十年的时

间里七次出使和更多次登陆斯里兰卡，其核心外交目的也只是希望斯里兰卡能够“遣使来朝”，以彰显明朝“威德四海，万邦来朝”的“明君盛世”。即便是发生了“明-锡兰山之战”，那也是郑和被逼无奈的绝地自卫反击。即使这样，明廷也没有顺势占领斯里兰卡，明成祖也只是“命礼部择其支属贤者更立之”并“悯其 作者注：指被擒之旧王 无知，…… 亦遣归”。[26]8444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对斯里兰卡一直施行“王道外交”，为今天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和平外交”带来了基于千年历史事实的可信性，有助于今天的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认同。在当代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外交交往和民间交往中，经常可以听到双方人员都说中斯友好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斯里兰卡前总统、现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就多次说过：“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历史悠久、牢不可破，是两国务实合作与中国长期以来支持斯里兰卡的根基所在。”[29]古代中国“王道外交”理念中的对“和平”和“仁义道德”原则的长期不懈的坚持和发展，是值得当代中国外交决策者学习和借鉴的。特别是是在回归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过程中，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各种挑战，在外交中轻言战端和过于重视物质的国家利益，对中国长远的外交发展都是有害的。坚守和平外交政策，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二）古代中国-斯里兰卡“朝贡关系”历史对今天中国-斯里兰卡“合作伙伴关系”的现实意义

虽然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国家关系跨越千年，但是两国形成相对正式的比较稳定的国家关系还是明代。明代中国以自身足够先进的文明软实力和自身足够富庶的物质硬实力为前提，通过“先进文明吸引”、“有力政治保护”和“适度贸易让利”驱动周边国家“臣服”中原王朝，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通过郑和七下西洋的方式主动与斯里兰卡等遥远的国家建立了朝贡关系。当有“朝贡国”遣使来朝满足了明廷的“盛世明君”的“政治虚荣心”后，明朝皇帝遵“薄来厚往”的太祖训和中华“王道外交”的惯例，一律加重加厚回赐“物质利益”给朝贡国。但是，基于“重义轻利”的儒家思想等因素，明朝基本上没有将物质利益放在外交政策的应有位置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物质利益只是附带的外交成果而不是明朝预设的外交目的。学者王日根、何峰就指出中华朝贡关系的一大弊端：“没有意识到由朝贡关系衍生的国际贸易定价权和货币发行权的对于国家利益的重大意义”。[30]44-54

过分追求政治利益同时又过分轻视经济利益注定了明朝无法可持续性地维持如此庞大的“朝贡关系”，特别是维持与遥远地区国家的“朝贡关系”。因为耗费巨大，永乐朝后，洪熙朝曾停止了下西洋。虽然到了宣德朝，明廷又以“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为由，派遣郑和第七次下西洋。[23]7768 但不久再次由于国力不济，以及国防战略重心转向北方，明朝不得不结束了下西洋。“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海外 30 余国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1]69 这里就包括斯里兰卡。自天顺三年（1469 年）最后一次遣使来朝后，斯里兰卡结束了与明朝的“朝贡关系”。

今天在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一定要辩证而不是对立地看待国家道义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为了国家道义，刻意地或者一味地忽视自身的国家利益，是注定无法长久地维持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反之，忽视中国的国家道义理念，盲目地模仿西方现实主义外交政策，那只会让“合作伙伴关系”因利而聚利去而散。中国-斯里兰卡两国都应该在符合“仁义道德”国家利益基础之上构建“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双赢。

（三）古代中国-斯里兰卡“民间交流”现象对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斯里兰卡人文外交的现实意义

“民间交流”是古代中斯国家关系中起到过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的外交现象。首先，古代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以贸易和宗教为主的民间交流为开启古代中斯国家关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预备”作用。在交通阻隔和知识缺乏的古代，正是通过长期的民间交流获得的可靠的地理知识和对方的国情知识，两国官方才得以相对正确地相互认知从而开展外交交流。其次，古代中斯民间交流为发展古代中斯国家关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延续”作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跨越千年的古代中斯国家关系时断时续，每次中断的时长几乎都是上百年或者几百年。如果没有两国人民贸易和宗教的民间交流来延续两国关系的“火种”，古代中国-斯里兰卡关系很可能就像古代中国和不少遥远国家的国家关系一样，中断以后就再也没有机缘恢复了。第三，古代中国-斯里兰卡民间交流为今天中国-斯里兰卡两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认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观念”作用。在两国国家关系中，“观念认

同”比“利益驱使”和“强迫接受”更能长久有效并且是更“低成本”地维持相互友好。今天当两国政府和人民因受益于两国千年友好关系而感慨时，更多的是感谢传递千年佛缘的高僧法显和不空，和平使者大航海家郑和。

今天，中国-斯里兰卡两国正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实现“合作双赢”基础上的沟通发展而携手努力。商业项目和政治合作可以增加两国的共同利益，但人文交流却能增进两国的相互认同。古代千年的民间交流带来了今天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两国关系的高度认同并为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信任基础。那么，今天的两国政府和人民也应该有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真心实意地开展中国-斯里兰卡两国的人文外交交流，造福于未来的中国-斯里兰卡两国和人民。

四、结语

依据信史，古代中国-斯里兰卡国家关系的历史开启于约公元五世纪初，而终止于约公元十五世纪中叶。古代中斯国家关系跨越千年，友好代代薪火相传。整个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经历了初探期、发展期和高峰期三个重要阶段。面对每个发展阶段的不同历史际遇，古代中斯国家关系都呈现出了不同的历史面貌。总体来看，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古代中斯国家关系始终贯穿的是和平、友好与发展的主题，其也始终沿着造福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前进。历史是一面镜子，它以过去的经验启迪今天的人们。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转型的中斯国家关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正确认知并且深刻理解古代中国-斯里兰卡关系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今天的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从历史的高度和深度观察和思考今天的两国国家关系。历史是逻辑连贯的，今天是过去的未来和未来的过去。总结古代中斯国家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意义，是为了与时俱进地构建更加稳定友好的今天的中斯国家关系，并造福未来的中斯国家关系。

参考文献：

[1] Rohan Gunaratna. *Sino-Lankan Connection: 2000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M]. Colombo: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State, 1986 :3.

[2] [斯里兰卡]尼古拉斯·C·W、帕拉纳维达纳·S.锡兰简明史[M] .李荣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2.

[3] 刘耀辉,唐春生.古代斯里兰卡与中国的交流与互动[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88-93.

[4] Rohan Gunaratna. S*ino-Lankan Connection: 2000 Years of Cultural Relations*[M]. Colombo: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inistry of State, 1988.

[5] 索毕德.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文化交流研究-以佛教文化为中心[D] .济南:山东大学,2010.

[6] Moratuwe Sasanarathana. *Lakdiva Mahayana Adahas (Third Edition)* [M].Colombo: Visudunu Published, 1999:123.

[7] 许道勋,赵克尧,范邦瑾.汉唐时期中国与师子国的关系[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6):77-82.

[8] P. Arunachalam. *Political Relations of Ceylon with China during the Middle Ages*[J]. Journal of The Ceylo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67).

[9] K. M. M. Werake. *A Re-examination of Chinese Relations with Sri Lanka during the 15th Century AD*[M]//C. R. de Silva and Sirima Kiribamune. Modern Sri Lanka Studies (Vol. ii). Peradeniya: University of Peradeniya,1989:89-102.

[10] Lorna Dewaraja. *Cheng Ho's Visits to Sri Lanka and the Galle Trilingual Inscription in the National Museum in Colombo*[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Sri Lanka. 2006, 52:59-74.

[11]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著.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2] 江勤政.我们和你们:中国和斯里兰卡的故事[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

[13] 注：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中斯国家关系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元始中…… 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1.）但此“已程不国”是不是斯里兰卡，学者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故本文不采信。

[14] [唐]姚思廉等主编.梁书(第五十四卷) [M].北京:中华书局,1973:800.

[15] [清]张廷玉等主编.明史(第十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6.

[16] [锡兰]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纳.锡兰简明史:从远古时期到公元 1505 年葡萄牙人到达时为止[M].李荣熙,译. 北京:商务商务印书馆,1972:22.

[17] J. W. MaCrindle.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Erythraean Sea* [M]. London, 1879: 1-39.

[18] [梁]沈约等主编.宋书(第九十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 1974:2384.

[19] 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55.

[20] [清]董浩等主编.全唐文·唐大兴善寺故大宏教大辩正三藏和尚影堂碣铭[M] .北京:中华书局,1983:3782-3783.

[21] [唐]慧祥.古清凉传卷下[M] .大正藏(第 51 册).日本,1934:1098.

[22] [明]宋濂等主编.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148,318,374.

[23] [清]张廷玉等主编.明史(卷三零四) [M].北京:中华书局,1974:7766-7767, 7768.

[24] 中国航海史研究会主编.郑和史迹文物选.[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12.

[25] 注：此碑现珍藏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碑文大多清晰可辨。

[26] [清]张廷玉等主编.明史(卷三二六) [M].北京:中华书局,1974:8444.

[27] Cyril Wace Nichola and S. Paranavitana. *A Concise History of Ceylo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in 1505*[M]. Colombo: Ceyl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28] 陈向阳.务实王道睦邻外交－21 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传统战略文化资源[J].江南社会学院院报, 2004(4):24-27.

[29] 唐璐.专访:新政府期待继续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访斯里兰卡新任总理拉贾帕克萨[EB/OL].(2019-12-09)[2026-06-02].

[30] 王日根，何峰. 明初海权扩张与朝贡体制重建[M] .学术前沿,2012(7):44-54.

[31] 李云泉. 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9.